上　　篇

改革开放　　辉煌二十年

1998年，勒马回首，中国改革开放已届二十年。二十年风风雨雨、步步惊雷，二十年中华崛起、经济腾飞，二十年国家昌盛、人民安康。

山东改革开放二十年，历经坎坷，披荆斩棘，一路辉煌。1976年粉碎“四人帮”，恢复国民经济两年徘徊，几多犹豫徬徨邓小平“出山”，冲破“两个凡是”堤防，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大解放；廓清迷雾，探索新路，孕育社会的变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五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起步，百废俱兴，农村改革首先取得突破，揭开历史新篇章。1984年，“包”字进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由沿海城市向半岛、内陆推进五年加快发展，创造惊世辉煌。三年（1989—1991年）治理整顿，梳理腾飞的羽翼，调整忙乱的脚步，清除前进的障碍，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革大潮复起山东抓住机遇，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开创发展外向型经济新局面“；八五”突飞猛进“；九五”稳健高速发展，齐鲁再创辉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两年徘徊，酝酿社会变革

1 :“ 两 个凡是 ”沿袭‘左 ”路

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改革，都是以社会的动荡为铺垫的。以 1978 年 12 月为起点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也不例外，正是以前长期的社会动荡孕育了这一历史性的社会改革。

“ 文化大革命 ” 十年内乱结束之后，中国又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华国锋本该顺应党和人民的意愿走上振兴中华的改革开放之路,不想他举起‘ 两个凡是 ’的旗帜,沿袭‘ 左 ” 倾错误老路，令人大失所望。

本来，人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1976 年 10 月 6 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起来。粉碎祸国殃民的‘ 四人帮 ’的历史性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从而结束了延续 10 年之久的“ 文化大革命 ” 内乱，使我们的国家有望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亿万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奔走相告，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胜利。亲朋好友相约聚会，举杯共贺“ 第二次解放 ”。一时鞭炮脱销、白酒售罄。一向紧跟中央、老实听话、处事谨慎的以白如冰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山东省

委遵照中央的部署、顺应人民的意愿,于 10 月 22 日在济南组织 60 万军民隆重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同时,全省各地市纷纷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到 24 日,全省城乡参加集会和游行活动的军民达 6800 余万人次。当时仅 7000 万人口的山东,达到如此空前浩大的集会游行规模,足见民众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喜悦之情和对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寄于厚望之意。人们殷切地希望迅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治理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和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平反冤假错案……

不要怪人们的希望太多,实是‘文革’造成的灾难太重:百业俱废,国势衰萎,纷争不息,民生凋蔽,冤狱遍地,民怨沸腾,是非颠倒,问题成山。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各族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据统计,十年‘文革’,冤案竟达到百余万件,包括受牵连在内的受害者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 1/9。

“文化大革命”,与其字面的含义相反,正是一场文明的浩劫。林彪、‘四人帮’施行毁灭文化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受到巨大破坏。

在科技界,大批科学家和科技人才被批斗,大批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被损毁,文献资料被焚烧,科研工作被中断,致使我国的科学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

在教育界,“停课闹革命”,学生成了造反和派性斗争的主力军,许多学校成为武斗据点而遭到破坏。“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文化知识成了罪恶和

反动的代名词,交白卷的反倒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亿万青少年因而失学或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致使文盲剧增,知识人才断层,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文盲和半文盲竟达到2.25亿多人!

文学艺术界更是重灾区,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被打成“牛鬼蛇神”惨遭迫害,无数古今中外典籍被列为“封、资、修”,付之一炬。八亿人口的大国,只能上演“八个革命样板戏”,其他一切文学艺术都被禁被封。

“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生产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规律和原则被当成“资产阶级的货色”,发展经济的有效规章制度和措施被视为“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上派性武斗,工厂企业停产闹革命,造成相当多的工矿企业生产瘫痪或半瘫痪。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总和。十年“文革”把国民经济推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另外,“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心灵创伤和思想上的毒害也是无法估量的。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毛泽东晚年错误发动、领导,被林彪、“四人帮”利用,给党和国家、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满腔希望迅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然而,人们的希望没有维持多久,又陷入了新的失望之中。

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并不像人们盲目冲动呼喊的那样“英明伟大”。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就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举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 的政治旗帜，阻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拨乱反正设置重重障碍。

人们不能理解，身为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何以这样糊涂？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文革”的错误必须纠正，非如此不能挽救党和国家。

了解华国锋的历史的人当然理解华的心态。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和极左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以沿袭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己任。他由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官员迅速跃升为党和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是因为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智慧超群，而是凭借机缘巧合。他曾以主持在毛泽东故乡修建韶山灌区，在‘文革’初期为千千万万‘朝圣’的人们修建通向韶山的专线铁路，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提拔。1976 年 4 月，在镇压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和批邓运动中，由毛泽东指定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在当时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极为憎恶的情况下，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是势所必然的明智之举，对阻止“四人帮”篡党夺权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逝世之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华国锋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在危急之时，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联手粉碎‘四人帮”，可以说一举两得：既挽救了党和国家，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当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是主要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中拥护他，寄厚望于他。但他此后的表现，却令人遗憾、失望。

华国锋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自居，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不但不纠正“文革”

① 《人民日报》，1977年 2月 7 日。

错误,反而完全肯定‘ 文革 ’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以一已之利,置党和国家命运于不顾。不必讳言,他坚持‘ 两个凡是 ’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阻挠人们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但是，华国锋设置的“ 两个凡是 ”的壁垒是无法阻挡拨乱反正的大潮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事情都必定会失败。

在粉碎‘ 四人帮 ’之后一段时间内,由于受‘ 两个凡是 ’错误指导思想影响,山东在整体上仍然沿着‘ 左 ’的路子滑行,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如在政治思想上，仍然坚持“ 以阶级斗争为纲 ’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继续在全省开展‘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致使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展迟缓。当然，应当肯定，山东省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清查了‘ 四人帮 ’在山东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原中共中央委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原中共中央委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延成等，被进一步揭露并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开始平反“ 文化大革命 ”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到迫害的干部的工作，逐步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但当时省委的一些负责人固守所谓“ 一派正确,一派错误 ’的派性观念,以自己‘ 一贯正确 ’划线,不仅阻碍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进行，而且伤害和错误地批判了一些领导干部。

2. 小平出山,揭开拨乱反正的序幕

人们在失望之后，并没有保持沉默。

1977 年 1 月 6 日，在寒风凛冽的北京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了大标语、大字报，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

反。

街头的宣传如同猛烈的风，由北京席卷全国，掀起亿万人民心池的波澜。

但是，10天之后，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罗织罪名，将此案伪造成“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的假案，下令逮捕了李冬民等十多个街头宣传的活跃分子（后来这个错案被平反）。同时，为了镇压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大字标语及要求为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件，华国锋大开杀戒。

以追查政治谣言为名，同年2月至3月，经华批发了中共中央5号、6号文件及国务院30号文件。文件规定，对写这样的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

街头的宣传暂时沉寂了，然而由此引起的人心动荡和政治斗争却更加激烈了。而且，这种斗争在最高层早已表露出来。

与人民相通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就几次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得到全党的共鸣，从而抵销了华国锋发动的继续批邓的作用。

华国锋继续坚持“左”的错误，于1977年2月7日，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正式公开提出“两个凡是”，以此压制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和镇压群众的正当要求。

这时，邓小平虽然身处逆境，但毫不畏惧地公开指出“两个凡是”是不对的，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河。

3月，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全面推行“左”倾指导思想和方针，继续宣扬“两个凡是”，强调必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说什么“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确定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在重压之下，陈云、王震等老一代革命家勇敢地站出来，在会上郑重提出恢复邓小平的领导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意见得到参加会议的大多数老同志的赞同。

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十分被动难堪。华强词夺理，抛出吴德制造的假案，解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这种逻辑混乱的假设当然不能自圆其说，更不能使人信服。他不得不从坚持“批邓”的立场上后退一步，并承诺“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邓小平也没有沉默。他在 4 月 10 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思想武器。5 月 24 日，邓小平在同汪东兴、李鑫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于情理的问题。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主席讲，一个人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主席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邓小平接着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毫不畏惧地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和智慧批驳了“两个凡是”。

为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又设置新的障碍。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以邓小平作检讨、承认错误、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为出来工作的条件。邓小平决断地回答：“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行动。”

在人民的企盼中，经过党内和社会上干部群众的斗争，邓小平终于复出。

1977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华国锋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讲”两个凡是”的情况，邓小平再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毛泽东倡导的联系群众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从此，在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上，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后，首先从科学教育文化战线入手，实现全面拨乱反正，进行改革的尝试。“文化大革命”是由这条战线开始的，首先整顿这条战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 8 月党中央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入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①] 他指出，建国以后 17 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辛勤劳动、努力工作的，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48 页。

“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大声疾呼要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

当年 9 月 19 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大胆否定了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即‘黑线专政’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他主张在高校招生工作中,恢复在‘文革’中被废弃的招生考试制度,并亲自拟定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纠正了按‘阶级路线’和‘家庭成分’招生的原则。他还强调学习的连续性，主张从高中生直接招生，否定了中学毕业要经过两年劳动才能上大学的错误做法。应该说，招生制度的改革，迈出了新时期中国改革的第一步。虽然这一步带有恢复性质，但在当时“左”的环境下，已经十分大胆。这一改革不但打开了“重灾区”教育战线的局面，而且影响和推动了其他战线的改革。

紧接着，在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到来的全国科学大会（1978 年 3 月)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肯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高度评价他们做出的贡献和成绩。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脱去了精神枷锁，如同获得第二次解放。

同时，在邓小平的主张、敦促下，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1977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政策的新局面。

经济领域内“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遗症主要是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混乱,商业流通堵塞,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铁路堵塞的问题。1976年12月至1977年上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整顿,一批企业趋于瘫痪的状况有所改变,生产上的混乱情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

以上这些主要由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革命家力主倡导和领导实施的拨乱反正举措,在山东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正面反映。在教育科学文化战线上,1977年10月,山东省召开全省招生工作会议,贯彻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了全省1977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工作,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学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1978年2月,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1980年改为社会科学院)。5月,山东省科学大会召开,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讨论修改了山东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表彰了先进集体、先进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成果。山东省委还召开了任命科技、教学人员职务大会,宣布提升209名科技、教学人员的职务。山东大学数学系讲师潘承洞在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曾两次达到世界领先地位,被破格提升为教授。1979年11月,省委决定成立山东省科学院,作为以新兴科学技术应用、发展研究为主的综合性科研机构。1978年6月,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统一学制,统一毕业时间,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材,开齐和上完规定的全部课程 要集

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 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变教师待遇过低的情况,关心教师的工作生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在此期间,全省教育事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校的教学秩序得到初步整顿，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热情普遍提高,教学质量开始好转。同时省文联、作协等群众文艺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

在经济领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山东省委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整顿了铁路交通、工矿企业秩序。1976 年 11 月至 1977 年 6 月,山东省先后召开了“ 农业学大寨 ”、“ 工业学大庆 ”和‘ 社队企业 ’等一系列会议,促进了全省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内生产总值， 1977 年达 2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3%,1978 年达 225 亿元,比 1977 年又增长 10.1%。工农业生产总值,1977 年达 36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1978 年达 399 亿元,又比 1977 年增长 10.4%。财政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度增加，并且做到了收入大于支出,1978 年收支相抵，节余 24.2 亿元。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山东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1977 年 10月,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占全省 40%的 105 万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增加了一级工资，人均月工资增加 6.24 元。

不管从全国还是从山东看，以上这些拨乱反正的举措和成果仅仅是局部的,而且由于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等‘ 凡是派 ’的阻扰,进展迟缓,难以为继。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8 年 2、3 月间，举行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党的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本应为‘ 文化大革命 ’结束的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是这两次会议没有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没有能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 文化大革命 ’时期和多年来党内‘ 左 ’的错误,而担任

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不同意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总而言之,就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固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在此期间,中共山东省委和省革委忠实地贯彻了党的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精神,追随“凡是派”的“左”的错误,因而迟滞和影响了山东拨乱反正的全面进展。

华国锋、汪东兴等继续坚持“左”的错误,引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与抗议,一场新的政治斗争风暴随之而起。

3. 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大解放

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鼓舞下,1978 年 5 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列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枷锁还远没有完全被打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弄清是非”。要用实践的结果去检查过去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工作,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非,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去认真地进行拨乱反正。而不应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向“凡是派”提出了公开挑战,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国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展起来。

华国锋十分震怒,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

“不介入”,并且找人谈话,批评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一时间,全国各报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围剿，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这场大讨论也没有按照华、汪的意愿冷下来。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这篇文章表达的精神。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并在不同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必须量力而行,努力抵制和克服仍然存在的‘左’的错误。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详尽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批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①]。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②]他主张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又一次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这是马列主义精髓、精华。

在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引导、支持和党内外广大

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

干部、群众积极呼应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这一大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1978 年 12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把思想解放的历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认为，搞四个现代化就要依靠实事求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

他的这个讲话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出了圆满的结论，也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基调。

在这场阵线分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令人惊讶的是,除《大众日报》于 5 月 13 日全文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外,自认为‘一贯正确’的山东省委竟然袖手旁观,恪守华国锋的所谓“不表态”“不介入”,直至 5 个月后真理标准讨论大局已定，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才在省委党校领导干部读书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43页。

班开学典礼上(10月16日)作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讲话,代表省委草草表态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而在此后10个月的时间内,省委仍未组织全省干部、群众认真讨论这一个重大问题,因而严重阻碍了全省思想的大解放,影响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各项工作的进展。

1979年7月26日至8月6日,邓小平来山东视察。7月28日,邓小平在青岛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负责人时,再次强调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不解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就不牢固,党的政治路线就不能贯彻。他明确指示山东省委要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补课,要重新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端正思想路线。

8月2日至5日,山东省委在烟台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了邓小平视察山东时的重要讲话,特别是认真讨论了邓小平关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进行补课、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的重要指示,研究部署了在全省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的问题。此后,真理标准大讨论才在山东真正开展起来。“亡羊补牢”,晚虽晚矣,总比不补的好。

4.“洋跃进”,大失调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间,国民经济摆脱了瘫痪、半瘫痪状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从1976年冬季开始,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不顾十年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脱离当时的国情国力,盲目地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相继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